

讀點厚選刊



读点鲁迅丛刊

第 二 辑
一 九 七 八 年

编 辑 者 读点鲁迅丛刊编辑组
爱辉县教师进修学校
印 刷 者 黑 河 印 刷 厂
出 版 时 间 一 九 七 八 年 二 月

(供 内 部 参 考)

10031

读点鲁迅选刊 第二辑 目 录

· 回 忆 鲁 迅 ·

- 追忆鲁迅先生……………宋庆龄 (1)
- 鲁迅先生说：“轻伤不下火线！”……………茅 盾 (3)
- “相濡以沫”……………叶圣陶 (7)

· 鲁 迅 研 究 ·

- 鲁迅研究浅见……………茅 盾 (10)
- 关于鲁迅思想发展的问题……………唐 弢 (13)

· 新 著 选 刊 ·

- 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选刊)……………李霁野 (35)
- 小引…………… (36)
- 鲁迅先生对文艺嫩苗的爱护与培育…………… (37)
- 践踏未名社的屠伯——北洋军阀…………… (59)
- 鲁迅先生的未名社售书处…………… (70)
- 从“云散”到“云破月来”…………… (81)
- 鲁迅先生最后一次会晤…………… (86)
- 和他的《绝命诗》……………

厄于短年的韦素园·····	(101)
为鲁迅先生佚简答客问·····	(111)
关于未名社结束情况再答客问·····	(113)
附 忆素园·····	(116)

介绍与期待

——从李霁野同志的新著

《鲁迅先生与未名社》谈记·····	高 信 (130)
-------------------	-----------

· 资 料 选 载 ·

中日两国人民战斗友谊的丰碑

——关于日译《中国小说〈阿Q正传〉——

国际无产阶级文学选集之一》的史料

介绍·····	丁景唐 (151)
---------	-----------

记日本译印的左联五烈士的纪念集·····	(152)
----------------------	-------

关于《阿Q正传》日译者山上正义回忆鲁迅

在广州的一些补充说明·····	(164)
-----------------	-------

鲁迅与增田涉·····	薛绥之 (172)
-------------	-----------

· 读 书 札 记 ·

关于鲁迅纪念五烈士的诗

——“梦里依稀慈母泪”和

“吟罢低眉无写处”试释·····	熊 秉真 (188)
------------------	------------

《呐喊》《彷徨》琐记

——学习《鲁迅日记》札记之二…… 包子衍 (195)

· 百 家 争 鸣 ·

也谈《自题小像》…… 徐斯年 (215)

不要将“诗美”杀掉

——也谈“灵台无计逃神矢”…… 张颂南 (224)

关于“灵台无计逃神矢”的一点浅见…… 曲 辰 (228)

我解说“神矢”的根据

——和楼适夷、赵景深同志再商榷…… 单演义 (232)

库必特的“神矢”…… 伊之美 (236)

“二十一岁”的年龄与“风雨如磐”的

“故园”…… 吴海发 (238)

《自题小像》究竟写于何年何月…… 吴奔星 (243)

关于《自题小像》作年两题…… 王若海 文景迅 (249)

从常明同志的“附记”说开去…… 陈友雄 (253)

· 鲁迅作品中的人物 ·

忆刘和珍烈士…… 张静淑 (258)

回忆鲁迅

追忆鲁迅先生

宋庆龄

鲁迅和杨杏佛一九一一年同在南京临时政府担任职务，但直到一九二七年同时加入中国济难会以后，两人才有机会相识。一九三二年夏，杨杏佛任中央研究院秘书时，请鲁迅先生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年秋季，鲁迅、蔡元培和我都被选为该同盟执行委员。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鲁迅住在上海虹口区，处境困难，因为那里有很多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和警察监视他。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时，鲁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时到会。鲁迅、蔡元培和我们一起热烈讨论如何反对白色恐怖，以及如何营救被关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革命学生们，并为他们提供法律的辩护及其它援助。这个同盟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一九三三年六月杨杏佛被暗杀后，同盟就停止活动了。

当时林语堂是同盟的委员，他要求同盟停止工作，说否则同盟的委员都将遭到暗杀。

英国文豪肖伯纳访问上海时，有一次来我家午餐，同盟的几位委员都在座。他早已受到英政府的警告，因而他在我处很少发言。当时林语堂滔滔不绝地同他谈话，致使鲁迅等没有机会同肖伯纳谈话。

我最后一次见到鲁迅是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在那里从南京来的苏联大使勃加莫洛夫设宴请客，鲁迅亦在座。席散后，放映苏联电影《夏伯阳》。电影完了后，勃加莫洛夫面询鲁迅对影片有何看法，当然他很希望鲁迅高度赞扬这部影片，但鲁迅回答说：“我们中国现在有数以千计的夏伯阳正在斗争。”

嗣后，鲁迅因患肺结核而不能再出门了。苏联政府请他到克里米亚的疗养院去休养，但他婉言拒绝了。一天早晨，我忽然接到冯雪峰的电话，在鲁迅家我曾见过冯一面。当我这次去鲁迅家时，冯同我走进卧房，只见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已经躺在床上溘然长逝了。他夫人许广平正在床边哭泣。

冯雪峰对我说，他不知怎样料理这个丧事，并且说如果他出面就必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当时我想到一位律师，他就是年迈的沈钧儒先生。我立即到沈先生的律师办事处，要求他帮助向虹桥公墓买一块墓地。沈先生一口答应，并马上去办理。

当时白色恐怖厉害，在鲁迅的追悼会上发言要冒生命危险。我也在会上致了悼词，可能有人记录下来了。记得当时在法新社工作的胡愈之亦在场。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日

鲁迅说：“轻伤不下火线！”

茅 盾

一九三五年十月革命节的下一天，A·史沫特莱（注1）通知我，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在当天晚上有一个小型鸡尾酒会，请我参加，并说当天晚上八点钟她开车来接我同去。晚上七点半，我到公共租界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广场）附近一家咖啡馆里等候她。这家咖啡馆是一些洋人和“高等华人”常去的地方，也是我和史沫特莱经常约会见面的地方。大约将近八点钟时，史沫特莱来了，说车子就在外面。我同她出去，看见汽车停在马路对面，是辆黑牌车（那时候上海私人用的汽车是黑牌）。史沫特莱自己开车。我们一直开进了外白渡桥旁边的苏联总领事馆。

参加鸡尾酒会的约二十多人，国际友人中我只认识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英文《中国论坛》的编辑，是一对夫妇。中国人中有鲁迅，许广平，郑振铎（注2），好象也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

大家随便吃一些东西，随便交谈。史沫特莱悄悄对我说，她和一些朋友都很关心鲁迅的健康，觉得他脸上缺乏血色，又听说常有低烧，容易疲劳。他们都希望鲁迅能够转地疗养。苏联早就想请鲁迅去游历并疗养，请他全家都去。怎样走？由何人伴送？苏联方面会很妥当地给安排的。

史沫特莱又说，这件事她已同鲁迅谈过，但鲁迅犹豫不决，因此希望我帮助促成鲁迅的决心。

隔了两三天，我到鲁迅家去，同他谈起这件事。我的话刚说了一半，鲁迅就笑道：“我料到史沫特莱一定要拉你帮助作说客的。但是我考虑的结果，仍下不了决心。”

我就问：“为什么呢？”

鲁迅说：“一旦到了苏联，我就成了聋子和瞎子了。”

我说：“苏联会配备一个翻译专门招呼你的。”

鲁迅又说：“我所谓聋子和瞎子还不是指的生活方面，是指的我对于国内的事情会不很了解了。”

我说：“这有办法。我们可以把国内的书刊逐日汇齐交给苏联方面，想法用最快的速度寄给你。你仍然可以写文章寄回来在国内发表。”

鲁迅听我这样说，沉吟了一会儿，然后摇着头道：“凡事想象是容易的，做起来不会有那么顺利。我猜想即使很快，书刊在路上也总要一两个礼拜，我写了文章寄回来，又要一两个礼拜。杂文都是根据当时情况，匕首一击，事隔一月，岂不成了明日黄花了么？”

我说：“不会成为明日黄花的。你的文章击中敌人要害，尽管迟一点，还是能够振奋人心。虎虎有生气的。”鲁迅听我这样说，只是微笑着摇头。

我换了一个话题，又说：“你不是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打算把《汉文学史》写完吗？到了苏联，这件事情似乎容易办了。”

我这个话似乎引起了鲁迅的思考。

我又接着说：“你到了苏联，就有机会碰到许多国际上有名的革命家和文化界进步人士，那时你把中国的情况对他

们说一说，而且，世界各地的有影响力的日报和期刊也一定要派人向你采访，请你写一点短文章。这样，对中国革命所起的作用，我猜想是大得无可比拟的。”

我这番话又引起了鲁迅的思考，他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说：“让我再考虑考虑罢，反正要走也不是一两星期之后就走得成的。”

这样，我就告别了。回家后我写了封短信给史沫特莱，大意是：大先生（鲁迅在兄弟中排行老大，同志们背后常以“大先生”称之）的心思有点松动了，过几天我再去试试。

隔了六、七天，我又到鲁迅家去。鲁迅不等我开口，就说：“我再三考虑，还是不去。前些时候，敌人在造谣，说我因为左翼文坛内部的纠纷感到为难，曾到青岛去住了一个多月。而他们竟也就此推波助澜。现在如果到苏联去，那么敌人岂不更要大肆造谣了吗？可能要说我是临阵开小差哩！我是偏偏不让他们这样说的，我要继续在这里战斗下去。”鲁迅说这些话时有点兴奋，眼睛看着我，眼光是沉着而坚定。我心里想，他大概是下了最后决心。不过我还是说了一句：“可是你的健康状态是大家关心的。”

鲁迅回答说：“疲劳总不免是有的，但还不至于象你们所想象的那么衰老多病。不是说‘轻伤不下火线’吗？等我觉得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再谈转地疗养吧！”

我觉得我已无能为力。鲁迅的战斗精神那样坚决，使我也不好再多嘴了。

第二天，我写信给史沫特莱，“大先生说，‘轻伤不下火线’，十分坚决。看来转地疗养之事只好过些时候再说了。”

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加上鲁迅经常低烧，出国疗养

之事也就无法再提了。直到半年后，鲁迅一场大病，朋友们又提起这件事，但那时鲁迅的健康状态已不适宜远渡重洋，只打算到日本镰仓小事休养（见鲁迅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中给我的信），但最后还是没有去成，而在十月十九日突然病发，终于不起。

一九七六年六月五日于北京

注 1

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0—1950）

美国女作家，新闻记者。1928年以《佛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身份来中国，在上海参加中国进步文化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前往延安，在山西前线做过战地救护工作。1941年因病回国，受到美国政府迫害。1949年流亡英国，次年病逝。遵照她的遗嘱：骨灰移葬中国。著有自传体长篇小说《大地的女儿》和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攻》及《中国的战歌》等。

注 2

郑振铎（1898—1958）

现代作家，文学史家。笔名西谛、郭源新，福建长乐人。1919年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时期留居上海，坚持进步文化工作。1945年以后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民主运动。解放后任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相濡以沫”

叶圣陶

鲁迅先生翻译法捷耶夫的《毁灭》，出版之后赠我一册，附来一封信。这封信久已失掉，不能完全记得，惟有“聊印数诗，以贻同气，所谓‘相濡以沫’，殊可哀也”的句子，当时看了极感动，后来一直忘不了。

《毁灭》的译本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间印成，鲁迅先生赠我这新印的书，或者就在当年，或者在下一年年初。那时候看到“相濡以沫”这四个字，首先想到的是鲁迅先生抓住了时代的特征：相识的不相识的许许多多朋友，如今不正象《庄子》里所说的“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的鱼吗？《庄子》的作者认为这许多“处于陆”的鱼“相句以湿，相濡以沫”并不足取，要“相忘于江湖”才好，鲁迅先生却赋与“相濡以沫”积极的意义，认为吐出唾沫来沾润沾润总有好处：这是第一层。再一层是这个“相”字值得仔细体会。唾沫要大家吐，不能我吐你不吐，惟有大家吐，沾润才是可能的。这可以想见鲁迅先生对“同气”的殷切的期望和策励。

自从一九一八年发表《狂人日记》直到一九三六年发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鲁迅先生用他的笔，对封建礼教，对现实政治，对内外敌人进行斗争，真可以说针锋相

对，坚强无比，勇猛无比。在这同一段时间里，他还做了别的许多事。参加斗争的团体。应邀作讲演。选译外国人的作品。介绍新兴的文艺理论和绘画艺术。组织和接洽出版刊物。阅读别人的稿子，给别人的稿子作序跋或者校对排版的样张。还有其他。假如说，这许多事全都具有对“同气”

“相濡以沫”和奋笔作各方面的斗争是他同等着力的毕生事业，惟其如此，所以他伟大，该不是不切实际的说法吧。

鲁迅先生逝世之后，我作一首輓诗，是旧体七言律句，末了两句是“相濡以沫沫成海，试听如潮继志词。”尽量多的人大家吐出唾沫来，会汇成海吧！这当然是想象。但是不仅是想象，这里头也表达了当时的实感。各界的人不经邀约，不凭通知，各自跑来瞻仰鲁迅先生的遗容，表示钦敬和志愿追随的心情。一个个自动组合的队伍，擎起写着标语的旗或者横幅，唱着当时流行的抗敌歌曲或者临时急就的歌曲，从上海的四面八方汇集到墓地，大家动手铲土，把盖上“民族魂”的旗的鲁迅先生的棺材埋妥。这样的事，上海从未有过，全中国从未有过。我所说的实感就是从这些情况来的。从这些情况，不是可以想到那么多人已经对鲁迅先生作出反映，各自吐出唾沫了吗？不是已经听到那么多的唾沫汇成的海里的潮声了吗？

以上说的是四十年前，后来就不同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自从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普遍传播之后，就不是什么“相濡”的问题了；鲁迅先生的业绩好比广大的海洋，是谁都得在这个海洋里鼓楫扬帆，向前航行的问题了。因此，如今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

我们要相互勉励，认认真真学习鲁迅精神。

临了要简单说说鲁迅先生提到“相濡以沫”的这封信怎么失掉的。“八一三事变”之后，我扶老携幼离开苏州，一九三八年的秋季到四川乐山教书，租住寓所在较场坝。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九日午后，日本侵略军的飞机二十七架空袭乐山，投下烧夷弹，烧死四千多人，烧毁三条热闹街道，较场坝是其中之一。我全家老幼幸而从后门逃出，居然一个手指头也没烧伤。但是所有的东西全烧光，一双筷子也没剩下。鲁迅先生给我的信就是在这一天烧掉的。

〔本文和茅盾先生的《鲁迅说：“轻伤不下火线”》一文系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资料》编辑部供稿。〕

鲁迅研究

鲁迅研究浅见

茅盾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有毛主席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示，于是引起一些青年人对“鲁迅的战友”胡风的注意。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这些青年人不过七、八岁，对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件事，大概并没留意，也许连胡风是个什么人也不明白。

然而，由于近年对鲁迅研究的开展，以及鲁迅书简新版的发行，他们在鲁迅答徐懋庸信中知道一些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情况，却认为胡风是鲁迅当年提出新口号前曾与商议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又从鲁迅书简、日记中看到当年鲁迅与胡风的关系，遂以为胡风是“鲁迅的战友”。

然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后，他们才知道胡风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头子，于是他们就发生了这样的疑问：既然胡风是反革命，为什么当年鲁迅却误认为好人？为什么鲁迅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竟看不透胡风的本质？连类而及，他们又发生这样的疑问：胡风而外，当时与鲁迅关系密切而且为鲁迅所赏识的某某等人为什么解放后成为右派？为什么鲁迅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竟看不透这些人的本质？

于是又有为之解答曰：胡风追随鲁迅时，受鲁迅影响，

鲁迅是他的信仰中心，胡风表现为对鲁迅亦步亦趋，鲁迅因此寄以信任；鲁迅死后，胡风失去了“信仰中心”，所以就变坏了。

这样的解答，显然不对。

鲁迅信仰中国共产党，崇敬毛主席；这在他晚年更加旗帜鲜明。胡风既然以鲁迅为信仰中心，亦就应该信鲁迅之所信，以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为信仰中心，怎么能说鲁迅死后，胡风就失去信仰中心了呢？可见胡风的貌似信仰鲁迅，其实别有用心，剥掉画皮，其原形是反革命。

然则鲁迅当年何以竟没有觉察到呢？

因为对于事物的认识，有个过程；对于胡风那样伪装得极巧妙的反革命两面派，认清其本质，也要个过程。鲁迅那时在白色恐怖之下，行动不自由，根本无从调查胡风的历史，亦不能知道胡风背着他的罪恶勾当。就是徐懋庸，他写给鲁迅的那封信中，也只表示了对胡风等的怀疑，而没有拿出证据来证明胡风之为反革命两面派。

而且反革命两面派的自我暴露，也有个过程。胡风和胡风分子是钻进革命阵营里为帝国主义、蒋介石法西斯政权服务的特务，他们必须打扮成左翼分子、革命青年，欺骗人们。他们伪装得很巧妙，隐蔽很深密，尾巴还没露出来。到了全国解放后，他们的人已经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他们自以为够强大了，他们觉得“时机”到了，公然向党进攻了，这就暴露了自己。

由此可见，鲁迅当时之没有看透胡风真面目是不足为奇的。

上面提到的那些热心研究鲁迅的青年，我并不相识，他们写信给我，提出了胡风问题，并且说他们中间对此争论不

已。朋友们劝我写篇短文，说说我的看法。我觉得那些青年们提的问题，正说明某些热心于鲁迅研究的青年，思想上还深受“四人帮”散布的形而上学的流毒，值得注意。现在，鲁迅研究正在继续开展。听说，对鲁迅一些旧体诗的解释，各有不同。百家争鸣，这是好事；然而，就我所见，有些解释是先立“假说”，然后在鲁迅日记、书简乃至同时的报刊文章中广求例证。我觉得这方法不对。因为先立“假说”，然后“求证”，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四人帮”搞的历史研究，用的正是这个方法：随心所欲，拼凑例证，以求适合他们“帮”理论的需要。“四人帮”这股流毒，不少人不知不觉中就染上了。现在华主席、党中央号召我们，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希望在鲁迅研究领域内，也要彻底扫除“四人帮”的流毒。

一九七七年十月七日